

康迪教育思想

主 编 赵 忠 贾永莹

副主编 牛宏泰 欧文军 王云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编辑委员会

主任：赵 忠 贾永莹

副主任：牛宏泰 欧文军 王云峰

编 委：李振岐 熊运章 刘彬让

康君奇 张清柱 薛 辉

李海华 李 论 李大寨

刘珍珠 潘 瑞 张进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迪教育思想/赵忠,贾永莹主编.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ISBN 7-81092-133-9

I. 康… II. ①赵…②贾… III. 康迪—教育思想—研究

IV. G40-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1974 号

康迪教育思想

赵忠 贾永莹 主编

出版发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陕西杨凌杨武路 3 号	邮 编:712100
电 话	总编室:029-87093105	发行部:029-87093302
电子邮箱	press0809@163.com	
印 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4.25	
字 数	102 千字	

ISBN 7-81092-133-9/G · 33

定价:1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com

写在前面的话

我国著名农业教育家和植物病理学家，原西北农学院康迪院长，离开我们已经 20 多个年头了。

物转星移，沧海桑田。20 多年来，我们的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学校所在的杨陵也发生了巨大变迁。这些，都是康迪老院长生前曾孜孜以求而未能实现的理想和愿望，在他的众多后来者的共同努力下，而今都变成了现实。这是足以告慰于九泉之下的康院长的。

历史是公正的。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被岁月的长河所湮没，但一个人用才能和品格所铸就的精神财富及人格魅力，会永远活着。一切有功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决不会为历史所遗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康迪老院长正是一个这样的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康迪同志曾两度担任我校领导工作，他在任期间，是我校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无论是培养人才还是科学研究以至社会服务，均为我校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足可谓“碑树民心”。同时，尽管康迪所处的时期政治运动不断，但他仍然以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思想遗产。如今事隔 20 多年，将他的教育思想加以总结，给我们以至后人留下一点可资借鉴的东西，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贾永莹同志曾长期在康迪同志身边工作，耳闻目睹了康迪同志的许多言行，因而与李振岐、熊运章等同志发起组织一批老同志收集、研究和整理康迪同志的教育思想，对此，我们深表敬佩并以此向学校有关领导汇报，得到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在各有关方面

的大力协助下,在我所同仁的帮助下,《康迪教育思想》这本小册子,今天终于付梓了,这是我们深感欣慰的事情。全书由赵忠、贾永莹、牛宏泰三同志策划、组稿和统稿,牛宏泰、欧文军、王云峰三同志负责审稿,刘彬让、康君奇、张清柱、薛辉、李海华、李论、李大寨、刘珍珠、潘瑞、张进升诸同志负责编辑和校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档案馆和出版社、印刷厂诸多同志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和汗水,在此向以上诸位同志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忱。

由于时间、水平等多种原因,书中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不足,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5年5月10日

康迪小传

康迪 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和农业教育家 ,中国现代植物病理学家。原名金光祖 ,抗日战争时期以“抗敌”两字的谐音 ,取名康迪 ,以表示对革命的决心。

康迪 1914年生于江苏省淮安县 ,193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 ,毕业后先后任广州岭南大学助教、广州中山大学讲师、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讲师等 ,曾在我国著名学者俞大绂、戴芳澜教授指导下 ,以研究员身份从事植物病理学研究工作。1937年 10月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先后任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教务主任、预科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农业科科长等。在当时延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深入实际 ,深入群众 ,坚持科学研究 ,推广农业科学技术 ,为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 ,1938年 10月 10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 12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 ,他以军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的接管工作。从此 ,他扎根西北的黄土地 ,拼搏、奋斗、奉献 ,历任西北农学院秘书长、教务长、副院长、院长、党委副书记、代书记达数十年之久 ,为西北农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为今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成长壮大、为培养祖国农业建设人才、为我国大西北农业教育与科学技术事业、为建设武功(今杨凌)农业科研协调中心(现已成为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期间 ,他曾历任陕西省农业局副局长、陕西省科委副主任、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武功农业科研协调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第四

届政协常委、中国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陕西省农学会理事长等。

由于长期忘我工作 积劳成疾 ,康迪于 1984年下半年住进医院。病重住院期间 ,他仍时刻关心西北农学院和杨陵科技教育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关心着西北农学院的建设与成长 ,病危时还嘱咐亲属 ,他去世后要把遗体奉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1984年 11月 14日 ,康迪离开人世 ,终年 74岁。他的一生 ,是革命的一生 ,是为祖国科技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 ,是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服务人民、拼搏奉献的典型代表。(此小传原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综合卷 10》,作者 :牛宏泰)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康迪小传	牛宏泰(1)
康迪教授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李振岐 贾永莹(1)
为农业科教事业奋斗终生——记康迪	张 慰(6)
深切怀念竭诚为祖国农业高等教育事业献身的康迪教授	
.....	许 萱(12)
追忆康迪院长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精神	毛绳绪(19)
康迪——卓越的教育家	傅维斌(23)
为农业教育呕心沥血感人至深	王建辰(32)
忆农业教育家康迪同志	熊运章(36)
高瞻远瞩全心全意为农业科教事业献身的革命者	
——缅怀康迪同志	朱象三(39)
献身西农的好院长——回忆康迪同志	杨 笃(44)
亦步亦趋说康迪	贾永莹(50)
忆康迪院长	李生秀(55)
康迪的办学思想与管理实践	高 昌(62)
深切怀念崇敬的康迪院长	王性炎(75)
对老院长康迪二次复出工作几件事的回忆	赵生权(78)
缅怀康迪同志	云立峰(82)
康迪同志在西农	赵世明(85)
康院长和我们心连心	贺普霄(87)
怀念康迪院长	罗志成(94)
忆康迪	杨春峰(97)

新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开拓者	牛宏泰(99)
一件小事.....	蒋尽才(110)
终生难忘的教诲.....	袁志刚 蒋尽才(112)
后记.....	(115)

康迪教授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李振岐* 贾永莹

康迪在西北农学院担任领导工作长达 30 余年,为西北农学院的建设和发展鞠躬尽瘁,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杨陵地区的农业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是一个科学家,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教育家。他为了发展我国的农业教育和科学事业,不惜放弃自己所喜爱的专业。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宝贵财富。

现就我们的亲身体会论述如下,与有志于农业教育和科技事业改革的同志们共勉。

一、以教学为主,教学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和科学研究,虽然也有工农业生产,但是,它主要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在建国初期,政治运动比较多,政治挂帅,思想先行,政治思想工作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一个时期,教育部又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教师、学生下乡下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教学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除了在建国初期的特殊情况下,教学工

* 李振岐,男,河北遵化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49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植保系,1957年赴前苏联莫斯科农学院进修,1982年赴美国蒙大拿大学合作研究。

作必须服从政治运动以外,在一般情况下,康迪同志始终坚持“教学为主,质量第一”的原则,把教学工作放在第一位,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狠下工夫。即使在1958和1959年,师生集体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的情况下,他也安排把教学任务带下去,要求教师除了在农村劳动锻炼进行思想改造以外,还要进行现场教学,完成教学任务。同时,他还布置了编写教材的任务,为理论联系实际改革教材内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处理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方面,他特别强调科学研究要与教学相结合,搞科研的教师也必须上教学第一线,不能脱离教学,他自己也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或讲课或听课,而且每学期都要带领学校有关部门负责人深入各系检查教学、科研工作进展情况,及时解决存在问题。

那个时期,学校工作的总的提法是“以教学为主、教学科研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这是与康迪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二、向国际先进大学学习,不断提高办学水平

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是我国进行各项改革的唯一出路。为了学习苏联进行教育改革,他除了邀请苏联专家来校讲学并介绍苏联高等学校的办学经验以外,还亲自到苏联访问。在访问期间,他特别认真地学习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的办学经验,他认为这个学校是我们对口学习的最好榜样。当时他在与留苏进修的教师谈话中,就提出要把西农办成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式的学校。要求他们除了学好专业知识外,还要注意学习它的办学经验。回国后,他在传达访问苏联情况时,更明确地提出要以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为目标,把西农办成季米里亚捷夫式的农业大学。对全校师生鼓舞很大。

在实践中,他也经常以此为目标,改进学校的各项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他在接待欧美专家的来访中,非常注意学习欧美大学的办学经验。20世纪80年代初,他积极争取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

银行的贷款,以美国有关高等学校设立专业科学研究中心为榜样,在我校创办了干旱半干旱研究中心,他自任主任,希望以此为起点,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的指导帮助下,把西北农学院办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农业学校。

三、延揽和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依靠大师办学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者,不是有大厦,而是有大师之谓也。”郭沫若也有一句名言“经师易遇,人师难逢。”办好一个大学,没有一批大师,是不行的。康迪和老院长辛树帜对于这个问题在思想上是很明确的。

康迪从1949年以军代表身份接管学校开始,就对当时在校的一些老教授非常重视,把他们看作学校的宝贵财富,在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陪同下,多次请他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在胡、马匪军反扑时,他亲自陪同并护送这些教授们转移到西安,并在西安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政策,听取他们对接管学校的意见。返校后,在新的院务委员会组建中,李赋都和虞宏正、邵敬勋等著名大师都被任命为院务委员会委员,负责管理学校。

为了进一步壮大学校的师资队伍,从1950年开始,他和辛树帜院长一起又从全国各地延聘了若干大师到校任教,迎来了西农历史上的第二次辉煌。与此同时,他还从原有的教师队伍中选派了几批中青年英才到苏联和国内著名大学进修。这些人回校后都成了学校的中坚力量,大师队伍进一步扩大了。

大师队伍的形成除了延聘和培养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保持和稳定的问题。这对于地处杨陵远离大城市的西农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就要看学校领导的凝聚力如何了。而凝聚力的形成是团结和爱护。这与领导者的品德素养有很大的关系。平易近人,礼贤下士,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康迪和辛树帜一样,他们在这方面是很得人心的。别的不说,单就“文革”以后,康迪重新返校

主持学校工作时,他虽年老多病,但仍不顾个人的一切,日夜操劳,落实党的政策,稳定人心。在他的小小办公室兼宿舍里,一天到晚,门庭若市。有的人哭着来,笑着去,在他病倒住院以后,仍有许多专家教授到医院看望他。他为西农鞠躬尽瘁的精神,感动了所有的西农人。他死后,许多人伏棺而泣,悲状空前。这在西农是很少见的。

四、谦恭自律,勤俭办学

艰苦奋斗,勤俭办学,这是我校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康迪同志在这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解放前学校领导的办公室就长期设在教学大楼内。康迪同志担任学校秘书长后不久,为了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就与学校几位领导共同研究,决定把学校党政领导机构全部搬到原女生宿舍的一座平房小院子里,使西农唯一的一座比较高级的楼房,全部用于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行政、办公室曾两进两出教学大楼,但最终还是落脚到一座小小的行政办公楼里。在他第二次回校任职时,食宿都在行政办公楼的一间小小的房子里。这种克己奉公的精神在群众中影响很大。他平时待人处事,非常平和,没有一点领导架子,他经常单身一人到师生员工中间去了解情况,从来没有举行过什么群众接待日,但是群众的呼声,他是了然于心的。谦恭自律,没有一点官僚习气,这是作为教育家最重要的个人品质。

五、立足学校,兼顾地区,为杨陵科教事业的发展开创创新的局面

以学校为中心,把杨陵地区建设成国家级的农业科技中心,这是西农人心中埋藏已久的一个愿望。早在1944年,当时的西农院

长邹秉文先生就在他所著的《中国农业建设方案》一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1946年9月15日，章文才院长又把这个问题向当时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提出，并作了具体化的阐述。但是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康迪同志担任西北农学院院长以后，对于这个事情非常重视。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在办好西北农学院的同时，立足西农，兼顾地区，为杨陵地区科教事业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

他先是以西农为依托，在杨陵地区积极发展和争取建立了一些教学和科研机构，如中国农科院陕西分院成立时，西农即划出土地，抽调人员，予以支持。他自己还亲自兼任该院的副院长。其他一些科教单位的成立，西农也在人员和土地上予以大力支持。在这些科教机构建立起来以后，他又积极争取大家加强协作。直到1978年，在他的积极呼吁和努力下，经上级领导批准，武功农业科学研究中心终于在杨陵成立，他亲自兼任该中心的主任，并从西农划拨土地，调动骨干力量充实这个机构。为加强各单位之间的协作，进一步促进杨陵地区的科教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从而使西农人和杨陵人的夙愿，终于得到了实现。

为农业科教事业奋斗终生

——记康迪

张 慰*

1940年初冬的一天,正在昆明清华农业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的康迪(原名金光祖),接到他三妹金正从延安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周老太爷病重,此次机会来之不易,如若错过,大概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随信并附寄给他一张由吴玉章签署的聘他为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教授的聘书。这封信中所说的“周老太爷”,是他们兄妹约定的关于时局的代词;“病重”,指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接读此信,他既激动又矛盾。激动的是延安需要他去,他所学的植物病虫害专业在延安有用武之地。矛盾的是再过几个月,他的研究工作和论文写作就可告一段落,如果现在就走,岂不前功尽弃?他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在来农业研究所之前,已是广州中山大学的讲师。为了能在学术上有所深造,他放弃了大学讲师的职位,师从中国真菌学家戴芳澜先生做研究工作。他是多么想做完这段研究工作,写出论文,拿到学位后再走。经过几天激烈的

* 张慰,女,湖北武汉人,1946年肄业于北京辅仁大学社会系,康迪夫人。曾任西北农学院马列教研室教师,后调西安交通大学任教,曾任教授。此文原载人民出版社发行的《延安儿女》一书。

思想斗争，反复权衡得失，最后他终于决定放弃眼前的一切，到延安去。既然决心已下，他就按指定的日期赶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龙飞虎同志接待了他。三天之后，他就搭乘八路军办事处开往延安的一趟车奔赴延安。从此，他更名康迪，与抗敌谐音，意思是从此走上了一条抗日的康庄大道。

到延安后，他就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预科任教务主任，教授生物课，一直到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1942年的整风，使他的思想感情上受到了巨大震动。如果说奔赴延安是他人生航向的转折，1942年的整风可说是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根本变化的起点。奔赴延安既是他本人觉悟的表现，也是他的家庭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发生分化的结果。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有兄弟姐妹六人，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妹妹金正就投身革命到延安去了。兄妹二人在广州碰面，妹妹希望哥哥随后也到延安去，哥哥则表示如果延安需要他，他会去的。而他的一个姐姐和姐夫，在沦陷后的上海，却投靠汪伪组织，当了大汉奸，是上海罪恶的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务机关）的重要成员之一。1940年他在昆明从一张上海报纸上得知姐姐、姐夫当了汉奸的事，这极大地刺痛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写信大骂当汉奸的姐姐和姐夫，可姐姐却又拉他回上海，许以高官厚禄、与美女成婚——这更使他感到羞辱。就是在这种国仇家耻交织的义愤中，在他妹妹的进步影响下，他奔向延安参加了革命。这说明他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参加革命的。至于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应具有怎样的人生目的，与党和人民应具有怎样一种关系，对他来说还并不是十分清楚。他虽然已置身革命行列，但在思想感情上并未完全从知识分子自命清高而实际上是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象牙塔之中走出来。整风运动使他认识到自己应该到生产实践中去，到劳动人民中去。整风结束后，他接受组织的安排，到延安光华农场做

技术指导工作。通过这个岗位，他参加到了农业生产第一线，运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去解决农业生产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提出严重危害谷子产量的蝥谷虫的生活史，提出了防治蝥谷虫的可行办法。这就是在谷子收割之后，发动群众掏谷槎。因为蝥谷虫的卵产在谷子的根部过冬，来年气温转暖后，逐渐发育成虫危害谷子。掏谷槎既可帮助群众解决烧柴问题，又消灭了蝥谷虫的虫卵，大大减轻了蝥谷虫的危害。为此，他走遍了从延安到绥德的每个村子，宣传推广蝥谷虫的防治办法，群众也普遍接受了这种防治办法。^① 1946年，他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农业科科长，这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相信他能为边区农业生产做出新的贡献。可是他却蹲在实验点上搞实验，迟迟不报到上任。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跟他谈话调动工作的，并先后三次催促他报到。他所以迟迟不报到，是因为思想不愿意做行政工作。他认为做行政工作杂事太多，没有技术工作单纯，令人陶醉。最后实在拖不过去，才勉为其难地上了任。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单纯技术观点，后来受到了同志们的严肃批评。这使他最终摆正了政治与业务、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和位置。康迪就是这样在党的怀抱中，接受教育，经受锻炼，逐步成长为一个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被人们誉为又红又专的党内专家的。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康迪作为军代表参加接管坐落在西安以西武功的西北农学院。军管结束，他就留在农学院，先后担任秘书长、教务长、副院长、代理党委书记等职，一呆就是20多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农业科技人才。反右斗争后，为了更好地贯彻党对学院的领导，上级组织准备安排他当院长。可他再三向上级组织

^① 1943年春节，延安中学秧歌队编了一个秧歌剧，名为《掏谷槎》，到处演出，宣传掏谷槎，很受群众欢迎。